

January 2019

The Trend of Early Writing Train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ority of Talent in Literary Creativity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Licheng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Xu, Licheng. 2019. "The Trend of Early Writing Train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ority of Talent in Literary Creativity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9, (1): pp.146-15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1/2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南朝士人群体“幼属文”现象的流行与 文论中“才主学辅”观念的确立

徐俪成

摘要:南朝士族子弟间兴起的“幼属文”之风,源于汉末以后“以名取士”的社会风气。晋宋之后,文章成为士人攫取名声,积累入仕资源的手段。在惧怕年命不永、以早达为高的社会风气下,南朝后期士族子弟出仕时间普遍提前,“幼属文”现象也逐渐向低幼化发展,学习属文甚至提到了学习《五经》和史传之前。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社会中大量出现以“幼属文”成名的早熟作者,社会舆论也更倾向于用“天才”解释文才的来源。这些舆论深刻影响了刘勰、钟嵘等齐梁间主要文学评论家,使他们在论及文学才能时更倾向于使用“才主学辅”的解释结构,将天才视为结撰文章的主要能力。这种观念深深影响了此后中国文论中对天才的崇奉。

关键词: 幼属文; 早仕; 文才; 才学关系

作者简介: 徐俪成,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中古文学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邮政编码:200241。电子邮箱:xiaoa3588@sina.com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汉魏六朝士人群体文人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17ECNU-HLYT034]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多元视域下的江南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8ECNU-QKT008]的阶段成果。

Title: The Trend of Early Writing Train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ority of Talent in Literary Creativity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bstract: The trend of early writing training among aristocrats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selecting officials by reputation” since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After the Jin Dynasty, the demonstration of literary skills had become one of the main methods of gaining reputation, and aristocrats thus had to get adequate training in writing skills since their childhood. Because of the fear of early death, aristocrat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clined to start their political career at very early age, so they could promptly rise to the positions high enough to enhance their family interests. To get a good start in political career, descendants of aristocrats had to advance the beginning of literary training, even before the studying of Confucian and historical classics. As a result, more and more teenagers showed their talent in literature before getting abundant knowledge, and literary theorists like Liu Xie and ZhongRong started to attribute the defining factor of literary ability to talent rather than learning. This opinion had been succeeded by later generations of literati and scholars, constructing the fashion of talent worship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s: early writing training; early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literary talent; talent-learning relationship

Author: Xu Licheng, Ph. D., a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literature of Medieval China. Addres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500 Dongchua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1, China.

Email: xiaoa3588@sina.com Funding: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2017ECNU-HLYT034);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018ECNU-QKT008).

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在研究《旧唐书·文苑传》时,曾经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旧唐书·文苑传》中)关于某人在年青时‘善著文’的说法竟一字未改地重复了八次,字句稍有变动但内容未变的也达十次之多。有三篇传记告诉我们这些文人在很小时(六岁、八岁和九岁)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了。”(19)傅汉思认为这种写法属于文苑传的固定模式,反映了“十世纪时史官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对于文学和文学创作的成见”(10)。事实上,只要我们将眼光稍稍扩展到更早的史书,就会发现,这种对幼年文学才能的渲染,早在南朝末年的史传中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这种风气的产生,则更可以追溯到汉末魏晋之际。近年来,随着敦煌文书和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唐代幼儿文学教育与“幼属文”现象进行了讨论,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视线延展到南朝以前,讨论“幼属文”之风产生的历史逻辑。以笔者管见,只有胡大雷先生《中古时期家族对儿童的“文学”教育》一文对南朝“幼属文”之风有过系统的材料梳理。本文拟在胡先生论文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继续深入讨论“幼属文”之风的形成原因,并试图以“幼属文”之风为背景,探讨刘勰、钟嵘讨论“才”“学”关系时普遍认同“才主学辅”的原因。

一、“幼属文”的定义及刘宋以前的发展状况

本文所谓“幼属文”,指文人在幼童时期撰写文学作品的行为。在研究这个课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定义所谓“幼属文”的年龄范围。

“幼属文”主要涉及孩童幼年学习文章写作的问题,因此应从关于幼年教育的史料中寻找相应的时间节点。战国到西汉的时期,孩童开始启蒙的时间还没有非常整齐的规定,到了东汉,这个时间划分基本被定为八岁和十五岁的统一标准。班固《汉书·食货志》提到:“馮子[……]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1122)班固参与讨论编纂的《白虎通·辟雍》对这个年龄划分做出了解释:“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学,学经术。”(陈立 253)在此基础上,成书于东汉后中期的《四民月令·正月》又载:“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本注:“成童已上,谓年十五以上至二十;幼童,谓九岁以上至十四。”(石声汉 9)这里对幼童和成童的划分,即以东汉初年以来“入小学”和

“入大学”的年龄为依据,说明这种划分已是“四民”的普遍共识。因此,本文也将“幼属文”的年龄定为十五岁以下的“幼童”时期。

在上述儒家典籍中,并没有提及幼童的文章写作训练,但至少在西汉后期,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在童年时代进行写作训练。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彫虫篆刻。’”(汪荣宝 45),可见其于童子之时就已经将作赋当作爱好。又《法言·问神》曰:“育而不茁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汪荣宝 166)可知扬雄之子扬乌在九岁时已经参与了《太玄经》的创作。^①此外《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幼属文”引《东观汉记》曰:“班固[……]九岁能作赋颂。因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2711)《后汉书·班固传》因言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范晔 1330)这也是“幼属文”最早的事例之一。

扬乌和班固的“幼属文”固然使人惊奇,但都有各自家庭特殊文学氛围的影响,在汉朝幼童中并不普遍。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文章在仕宦中作用的提高,出现了边韶这样“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范晔 2623)的专门文章教育家。幼年的文章训练,也从零散的个人爱好,逐渐成为了社会风尚。如徐邈“七岁涉学,诗赋成章”(李昉编 1780)。周不疑“年十三[……]时有白雀瑞,儒林并已作颂,不疑见操授纸笔,立令复作。操异而奇之。”(1781)《文选注》引《三辅决录》言士孙萌“少有才学,年十五,能属文”(萧统编 1105)等等。特别是在《三国志》及裴注对曹魏王室的记载中,曹丕“年八岁,能属文。”(57)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557)曹叡也是“少好学,年十余岁,能属文。”(583)普遍有幼属文的事迹。这也与曹氏父子本人对文学的爱好与曹操对诸子“少诵诗、论”(魏宏灿 301)的要求分不开。

由于统治者的个人爱好,在整个曹魏时代,“幼属文”的事迹不绝于史,比如《三国志·魏志·诸夏侯曹传》裴注引荀勖《文章叙录》及《世语》说到曹操的连襟夏侯渊的儿子夏侯惠和夏侯荣,一个“幼以才学见称,善属奏议”,另一个“幼聪惠,七岁能属文”(273)。这都是少年文章天才。曹魏九品官人法成立之后,“才”“地”成为取士的两个重要标准。其中门第决定的“地”固然是最关键的因素,但在门第相同的情况下,想要取得理想乡品,还需要让中正对自己做出有“才”的品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才”的偏重不同,在三国时期,“文才”已经成为“才”的重要内容了。如《三国志·魏志·裴潜传》言裴秀:“弘通博济,八岁能属文,遂知名。大将军曹爽辟。”(673)《晋

书·裴秀传》引渡辽将军毌丘俭将裴秀推荐给曹爽时说：“生而岐嶷[……]博学强记，无文不该[……]非徒子奇、甘罗之俦，兼包颜、冉、游、夏之美。”（1037—38）在这里，“幼属文”的事迹已经成为毌丘俭推荐裴秀时重点强调的优势。

二、齐梁追求早仕之风与属文年龄的提前

到了南朝，士人群中崇尚文才之风愈发浓烈，《南史·王俭传》言：“先是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595）可知文才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学。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南朝士人群体对幼年文章训练的重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钟嵘《诗品序》说到南朝士族习文的风潮时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钟嵘 54）可知在朝廷政策和社会风气的双重推动下，尚在“裁能胜衣，甫就小学”之时便开始学习文章写作，已经成为“士俗”间的常态。

在南朝以前，早慧并非当时人人都推崇的美德。《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引诸葛亮与兄长诸葛瑾的书信中提及儿子诸葛瞻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932）不但为儿子的早慧感到欣慰，反而认为孩子失去了成大器的空间。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不少人在教育子女时，并不一味追求早慧。曹魏王昶在《诫子侄书》中说：“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陈寿 745）因此他为子侄们取名沈、默、浑、深，告诫他们不要着急露名扬己。

但是到了南朝以后，史书中对早慧的记载不断增加，戒早达、尚晚成的舆论逐渐消失，士族子弟竞相以早成为荣，甚至形成了“早达”的具体年龄标准，如《南齐书·徐孝嗣传》载：“（徐）孝嗣姑适东莞刘舍，舍兄藏[……]语舍曰：‘徐郎是令仆人，三十余可知矣。汝宜善自结’。”（771）《南齐书·王融传》载：“（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822）《南齐书·张欣泰传》载：“（张）欣泰少时有人相其当得三公，而年裁三十。”（884）《梁书·武帝纪》载：“（王）俭一见（萧衍），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2）可知南朝高门士族子弟中间，普遍流行一种“三十为侍中/令仆/公辅”的仕宦预期，能达到这种预期，方才会对自己的仕宦经历比较满意；相反，如果士族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得到美职，则会非常沮丧，如《南齐书·陆慧晓传》载：“（陆慧晓）除为尚书殿中郎。邻族来相贺，慧晓举酒曰：‘陆慧晓年逾三十，妇父领选，始作尚书郎，卿辈乃复以为庆邪？’”（805）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官员铨选的人甚至当时的执政

者都会因此受到责难，如《宋书·谢景仁传》说：“景仁[……]年三十，方为著作佐郎。桓玄[……]谓四坐曰：‘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1493）《南史·范晔传》说：“初，何尚之处铨衡，自谓天下无滞才，及（孔）熙先就拘，帝诘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犹作散骑侍郎，那不作贼？’”（855）这皆是显例。

南朝士族中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崇尚早达的风气，早历清显为自己和家族带来的荣誉和利益自然是最关键的因素；与此同时，这种风气还与当时士人对自己年寿的预期有关。《世说新语·贤媛》载：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刘义庆 801）

对于寒人来说，升至才华可得施展的官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位兵家儿最终能达到的成就，与他的寿命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士族来说，虽然仕途会比较顺利一点，但是年龄仍旧是他们前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南史·江淹传》载，江淹三十五岁即为齐中书侍郎，“王俭尝谓曰：‘卿年三十五，已为中书侍郎，才学如此，何忧不至尚书金紫？’所谓富贵卿自取之，但问年寿何如尔。”（1450）从王俭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南朝人的认识里，年寿正是预测仕途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南朝人如此看重年寿对仕途的影响，也与南朝以后士人对自己寿命的预期普遍降低有关。《南史·顾协传》言：“张率尝荐之（顾协）于帝（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1519）在北来士人眼中，南方卑湿之地会明显影响自己的寿命，因此三十岁已经算是衰年了。在这种认识下，即使王谢高门中，也不乏对子女寿命的担忧，《梁书·文学·谢征传》载：“征幼聪慧，（谢）璟异之，常谓亲从曰：‘此儿非常器，所忧者寿；若天假其年，吾无恨矣’。”（718）谢璟是谢征的父亲，他在孩子幼年前程似锦之时，却说出了“所忧者寿”这样的悲观评语，并非杞人忧天，《宋书·谢庄传》载谢庄与刘义恭笺，自述谢家“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2172）这可见年寿之忧确实是谢家代代相承的诅咒。

不论一个人的地胄才华多么显赫，仕宦经历多么“平流直进”，总还是要走完一定的流程，不可能刚解褐便当上宰相。如果一个“有公辅之望”的士族子弟，活不到兑现“公辅”的年纪就在升迁的过程中英年早逝的话，不仅自己的优质资源付诸东流，也会影响到家族“世胄”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有才华的士族子弟希望自己能在三

十岁“已衰”之前获得“侍中”“公辅”之类的美官,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世家子弟为了早日达到“三十公辅”的目标,一方面需要加快转官晋升的速度,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提前解褐的年龄。据《梁书》载,南齐末年,萧衍上表齐和帝,陈说限制入仕年龄的弊端,表中说当时“俗长浮竞,人寡退情,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实昏童,籍已逾立,滓秽名教,于斯为甚”(23)。由此可知,当时士人甚至会刻意更改户籍,增加自己名义上的年龄,达到提早入仕的目的。为了应对这种年龄作弊的情况,在南朝几乎每代皇帝都有限制入仕年龄的措施,但绝大部分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南史·谢庄传》载:“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至是(宋孝武帝时)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555)限年入仕的命令不到一代便告失效;《梁书·武帝纪》载梁武帝天监四年诏令:“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41)但就连规则的订立者梁武帝自己,也在破坏着自己的规则,《陈书·王冲传》载其“年十八,起家梁秘书郎”(235);《梁书·王份传附王锡传》载王锡“十四,举清茂,除秘书郎”(326);与之齐名的张缵则“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李延寿 1385)。如果以上三位作为皇亲,还不具有说服力的话,那么《陈书》载陈郡殷氏的殷不害“年十七,仕梁廷尉平”(424),《北齐书》载琅琊颜氏的颜之推“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620)等例子都可说明,在年寿焦虑的刺激下,梁武帝限制入仕年龄的努力对高门士族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②

三、幼童教育中文章与学问的先后关系

宫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研究》中讨论魏晋人士争取乡品的情况时论断说:“当时,一般以二十岁为出仕年龄,为了取得高的乡品,就必须在此之前成为社交界的明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正规的学习是来不及的。”(107)到了齐梁两代,既然许多士族子弟都希望能在二十岁以前解褐,那么成为社交界明星的年龄就需更加提早。这又进一步提早了士族子弟开始学习的年龄。正如《颜氏家训·勉学》中所说,当时“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王利器 141)。这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文章训练也是幼童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晋宋之交的陶渊明在《责子》诗中抱怨自己的五个儿子,中有曰:“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龚斌 262)生动体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们在十五岁“志学”之前的幼童时代不愿接受“文术”学习的焦虑。

按照儒家传统的教育观念,幼童所受的教育的内容,除了“六甲”“九九”之类生活基本知识之外,就是“六经”和“六艺”等儒家经典与礼仪,并没有学习其他内容的空

间,但到了南朝以后,世俗关心的学业,渐渐从经学转向了文学,这种转向也体现在了世族对子弟的教育中。裴子野在《雕虫论》中申说:“宋初迄于元寿,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李昉,《文苑英华》3873)在裴子野看来,刘宋以来好文之风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年少”“总角”之幼童,在本该学习儒家经典六艺之时,将时间都耗费在了诗文写作上。

裴子野的观察也可以在史籍中得到验证,《陈书·谢贞传》载梁朝末年:“(谢贞)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读记便诵。八岁,尝为《春日闲居》五言诗,从舅尚书王筠奇其有佳致,谓所亲曰:‘此儿方可大成,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由是名辈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426)可见谢贞在学习《论语》《孝经》之后,便马上开始练习撰写五言诗,再过五年以后,才“略通《五经》大旨”。又如《南齐书·高逸·顾欢传》言:“(顾)欢年六七岁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遂知六甲。家贫,父使驱田中雀,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八岁,诵《孝经》、《诗》、《论》。”(928)在文中,顾欢作《黄雀赋》的年龄是“六七岁”,正与学习“书甲子”同时,而在作《黄雀后》两年之后,八岁的顾欢才开始背诵儒家经典中最基础的《孝经》和《论语》。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南朝世族中那些“幼属文”的孩童,在开始学习写作时,大多数没有经受过完整的经学训练,也没有读过太多史传杂著,自然谈不上博学。事实上此时幼童在培养语感,学习诗文体式、音韵、章法、句法时所凭借的教材,主要是前人的文学作品,因此阅读、背诵前代诗文经典也成了幼学的重要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520)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1452)《陈书·傅縡传》载:“縡幼聪敏,七岁诵古诗赋至十余万言。长好学,能属文。”(400)从背诵诗赋的年龄来看,他们背诵前代诗文作品的时间,应该已经先于通读《五经》和史传的时间了。《隋书·李谔传》载李谔上书隋文帝,要求改革当时江左传来的奢靡之风,文中江左竞骋文华的风气下,“闾里童昏,贵游总角,未窥六甲,先制五言”(1544)。儿童纷纷将诗文的训练提早到经史之前。而对那些“未窥六甲,先制五言”的孩童来说,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在文章中表现出太多学问修养了。

四、幼属文的特性与齐梁文论对“才”“学”关系的讨论

“幼属文”之风导致的先属文、后学问的学习轨迹,

也影响到了齐梁文论中对文学创作时“天才”“学问”关系的认识。六朝以来,随着文学在社会文化中地位的提高,关于文才来源的讨论也逐渐兴盛起来,其中“学问”和“天才”则是六朝文人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最为关心的两个因素。

由魏晋到南朝,士人们在学术领域关注的重点由玄理渐渐转向博学,在儒、玄、文、史四个领域中,都表现出崇尚渊博知识的风气(胡宝国 165)。从文学方面看,以颜延之、王俭、任昉等人为代表的作家,在诗文中酷爱用典,在极端的例子里,已经到了每句皆用典的程度(何诗海 30—34)。要写出这样的文章,前提是阅读大量经史百家之文,积累大量的词汇量和典故量。故此汉魏六朝文人常常论及学问对文章创作的重要性,《文心雕龙·事类》引曹操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615)。认为张子的文章水平不高,主要是因为不够博学。《晋书·殷仲文传》载:“(殷)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2605)这也强调了博学广览对提高文才的作用。

虽然两晋南朝史传中,“博学善属文”是称赞文士的常用套语,但随着出仕年龄的提前,六朝士族子弟开始文章学习的年龄也越来越小,许多以“幼属文”打出名气的士族子弟们,在“能属文”之时,连通五经都不一定能做到,更遑论熟读各类史传杂记,达到“博学”的水平了。现实的变化,使人们难以再用“博学”来解释少年才子们的文才来源,只得转换思路,将文才的产生归因于少年的“天才”与“天分”。

儒家经典中本有关于天才的叙述,《论语·述而》中孔子明确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何晏 邢昺 2483)可见儒家经典虽然承认“天才”,但从未将“天才”看作君子不可或缺的素质。而到了齐梁以后,文士们对“天才”变得越来越热衷,在文章中颂美他人“天纵生知”的情况变得屡见不鲜,如王融为齐文惠太子所作哀策文言其“诞惟妙善,克自生知”(严可均 2863)。沈约《武帝集序》言萧衍“诞纵自天,生知在御”(3123)。萧纲在《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中言萧统“禀仁圣之姿,纵生知之量,……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3002)等等,几乎已经成为奉承权贵的套语。《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中将“幼有文章之敏”当作“纵生知之量”的证据,可见“幼属文”已经是“生知”的表现之一(3002)。

除了上述抽象形容之外,南朝人还常常会用“梦中得才”的故事,将这种“天才”产生的过程,形象地表现出来。类似故事最早出现在《太平御览》所引刘宋臧荣绪撰写的《晋书·罗含传》中,后来被收入唐修《晋书》:

(罗含)少时梦五色鸟入怀,遂取吞之。含

觉,胸中如吞物,意谓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鸟有文章,汝当善文章矣。”果如其言。(1838)

到了齐梁以后,此类故事越来越脍炙人口,而且被套用到了不同的人物身上。

江淹[……]少而沉敏,六岁能属诗。及长,爱奇尚异。自以孤贱,属志笃学,泊于强仕,渐得声誉。尝梦郭璞谓之曰:‘君借我五色笔,今可见还。’淹即探怀,以笔付璞。自此以后,材思稍减。(萧统编 744)

(任昉)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裴氏,尝昼寝,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裴怀中,心悸动,既而有娠,生昉。《梁书》251)

(徐陵)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时宝志上人者,世称其有道,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之,宝志手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谓之颜回。八岁能属文。《陈书》325)

(纪少瑜)年十三,能属文。[……]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道进。(李延寿 1786)

关于这类故事,周勋初认为产生于六朝战乱频生的社会里人们热衷“占梦”,用来在混乱的社会中增加确定性的风气。^③但是从文本特征上来说,这几则记梦的故事则更像《宋书·符瑞志》中记载的那些神授君权的灵梦,这类故事的流行,很好地体现了南朝人对文章才能“非学而得”的广泛认可。

这类“文才天授”的故事,也影响到了南朝文论的作者。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自称:“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725)第一个梦中的“七彩云锦”显然是上引故事中“五色笔”“五色鸟”“彩旗”的又一形态。刘勰在做了这两个梦以后“怡然而喜”,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726)。不但对“文才天授”的观念深信不疑,甚至将之当成了自己从事文论写作的动力。

南朝另一位重要文论家钟嵘,也深受此类故事的影响,他在《诗品》对江淹的评价中特地引录了《梁典》中“江郎才尽”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一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句,故世传江淹才尽。”(306)这里钟嵘不但将

江淹之才的来源归为天授,而且又进一步将“江郎才尽”的原因归结于上天对文才的回收。在钟嵘这里,天才对文章写作能力起到的作用,无疑更为关键。

由于深受“文才天授”观念的影响,钟嵘和刘勰在讨论文才时,虽然也重视学问的作用,但又往往将天才的重要性置于学问之前。例如刘勰虽然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极力强调博学对文章的作用,但他又说:“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615)在刘勰一贯的折中观念下,他努力强调才学两者不能偏废,但是在“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等等文辞中还是显示了在刘勰的理论中,要写好文章本质上还是要靠“才”而不是靠“学”,博学只是为完美地发挥“才”提供条件而已。^④

到了专论五言诗的钟嵘《诗品》中,“才”相对于“学”的支配地位变得更为突出。在《诗品》里,钟嵘首先区分了文和诗两种文类对用典的需求差别:“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174)在吟咏情性的五言诗那里,“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74)。刘宋以来重视博学比类的作品使“文章殆同书钞”“拘挛补衲,蠹文已甚”(180—81)。之后,钟嵘将决定作品优劣的关键因素归结到了作者本人的天分上:“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181)所谓的“自然英旨”,即天赋的才能情性,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天资”之“才”。在对任昉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钟嵘心中两者主次的不同。《诗品》卷中评价任昉曰:“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316)任昉少年时期就没有作诗的天赋,在晚年达到“博学”的水平以后,喜欢在诗中彰显自己的学问,反而带坏了一代诗风。这样的评论,与钟嵘无视江淹晚年学问更深的事实,将晚年江淹文章水平的退化,归结为“天才”的消失,采用了相同的逻辑。

刘勰和钟嵘的论述,都明确区分了文章写作中“学问”和“天才”的不同功用,并且均将作者的“天才”作为决定文章优劣的最主要因素,在晋朝之前的文论里,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分疏。齐梁时代的人会津津乐道于“天才”的重要性,对儿童早慧的关注,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刘勰、钟嵘为代表的“才主学辅”的文学观也影响了隋末唐初史家对文才的看法,李百药在《北齐书·文苑传序》中说:“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凤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602)完全将“天”定为文才的最主要来源,而“摛黼黻于

生知,问珪璋于先觉”的表述,针对的显然就是那些在五六岁即能属文的神童们。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所谓“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的比喻,正与徐陵母“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刘勰“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之类的“天授文才”之梦若符合契,可见类似“天授文才”的故事的影响,已经从文学批评领域转移到史学领域了。

结 论

梁朝后期进入北齐的颜之推在撰写《颜氏家训》时特地告诉子弟:“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王利器 237)在这里,颜之推特地地区别了决定学问和文章成就的主要因素:决定学问好坏的因素是积累,纵使缺乏天资,只要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总能做出“精熟”的学问;而决定文章优劣最重要的因素是作者的天才,不论作者多么努力,没有天才还是无法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不如干脆放弃以文章成名的想法。不少学者将这段话当作南北朝文论中讨论“才学主次”问题时赞同“才”高于“学”的例子。然而在关注这段话文论方面的内涵时,我们还应该注意,颜之推写下这段话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对才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弟们,如何在年轻时就做好学习规划,正确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此,颜之推在这里强调“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与其说是发表自己的文学观点,不如说是一种出于实用主义的告诫。

重新审视这段话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中古时代的文论,很多都不是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单纯背景下展开的,在文论中体现的文学观点,常常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乃至文学训练等实用目的关系密切。本文所讨论的南朝后期“才主学辅”观念的形成,就是如此。虽然关于“才性”的讨论,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十分热烈,但正因为南朝士族社会对文章创作的极度关注,才使得人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中重新审视“才性”问题,开始在文才和天性的关系上做文章;正是因为南朝士族为了兑现自己“三十为公辅”的期望,将出仕年龄不断提前,才使得士族子弟不得不在“博学”之前学会写文章,不断生产“文才天授”的故事,强化人们对“文章天才”的认同,最终在重视“博学”的社会整体气氛中,使“才主学辅”成为文才来源的主流观念。和颜之推不同,刘勰和钟嵘的本意,自然是要讨论理论化的问题,但他们的观点背后,却隐含着社会风气变化下,人们对于子弟文章才能培养的现实关切。

南朝以后,“才主学辅”的文才观依旧不断绵延。陆扬认为,如《文心雕龙》中“能在天资”之类“以才性为文学之本的观点到了唐代更被发扬光大,加上对政治书写的力量的渲染,造成文学才能的神秘化。”(246)赵树功则进一步说明,在唐朝之后,这种崇奉文才的观念更是深入

文人的内心,影响遍及诗、文、词、曲、小说的批评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核心观念之一。(59—68)如果说对“能在天资”的认同,将强烈的神秘性赋予文章创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才崇拜的重要原因;那么南朝“幼属文”现象的流行,正应视为文才崇拜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滥觞之一。

注释[Notes]

- ① 在汉魏之际,扬乌为父亲作《太玄》时出谋划策斟酌字句的具体故事就已经非常流行,很可能是最早被称为“圣童”的幼儿。参见王子今:《汉代儿童生活》(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又王子今:“汉代齐鲁‘神童’”,《齐鲁文化研究》7(2008):129—39。
- ② 关于南朝各阶层士族的起家年龄,参阅川合安《南朝贵族制研究》第九章《南朝官人の起家年齢》(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第258—69页。
- ③ 关于六朝文人的梦,参见周勋初:“刘勰的两个梦”,《周勋初文集》第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6—107页。相关讨论亦可见小南一郎:“六朝文人たちの夢”,《未名》7(1988):59—70。
- ④ 关于《文心雕龙》中“才主学辅”思想的阐释,参见赵树功:“论刘勰文才思想的天人视域”,《文艺理论研究》5(2006):77—79。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Ban, Gu.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Ed. Yan Shig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 曹丕:《曹丕集校注》,魏宏灿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 [Cao, Pi. *The Annotated Complete Works of Cao Pi*. Ed. Wei Hongcan.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
- 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 [Chen, Li. *Annotations to Bai Hu T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
- 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 [Chen, Shou.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Ed. Pei Songz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1.]
-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Fan, Wenlan. *Annotations to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 范晔:《后汉书》,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Fan, Ye. *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Ed. Li X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Fang, Xuanling.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傅汉思:“唐代文人:一部综合传记”,《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倪豪士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Frankle, Hans H. “Tang Literati: A Composite Biography.” *Discussions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by American Scholars*. Ed. William H. Nienhauser.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Gong, Bin. *Compi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ao Yuanmi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何诗海:“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文学遗产》4(2005):23—34。
- [He, Shihai. “A Cultural Observation over the Allegories of the Literati in the Qi and Liang Dynasties.” *Literary Heritage* 4(2005): 23—34.]
-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He, Yan. *Interpretation of Analects*. Ed. Xing Bing. *Th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Annotations*. Ed. Ruan Yua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4(2009):151—171。
- [Hu, Baoguo. “Knowledge First: The Learning Atmosphere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en Shi* 4(2009): 151—171.]
- 胡大雷:“中古时期家族对儿童的‘文学’教育”,《梧州学院学报》1(2008):69—77。
- [Hu, Dalei.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in the Medieval China.” *Journal of Wuzhou University* 1(2008): 69—77.]
- 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 [Li, Baiyao. *Book of Northern Q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2.]
- 李昉编:《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 [Li, Fang. Ed. *Imperial Readings of the Taiping Er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 [——. *Finest Blossoms in the Garden of Literatur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6.]
- 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Li, Yanshou.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Lu, Yang. *Literocracy and Empire: A Study of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 [Miyazaki, Ichisada. *A Research on the Nine-rank System: Before the Era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Trans. Han Sheng and Liu Jiany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Shen, Yue. *A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Shi, Shenghan. *Compi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he Simin Yuel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Wang, Rongbao. *Annotations to Model Saying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Wang, Liqi. *The Variorum of Family Instructions of Master Y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 [Wei, Zheng. *History of the Su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 萧统编:《文选》,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Xiao, Tong. Ed.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Ed. Li S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 [Xiao, Zixian.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Q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2.]
-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 [Yan, Kejun, ed. *Collected Literary Works from Antiquity through Qin and Han to the Six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 [Yao, Silian. *A History of the Li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 :《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 [——. *A History of the Chen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2.]
- 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Liu, Yiqing. *Notes to The Tales of the World*. Eds. Liu Xiaobiao and Yu Jiay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赵树功:“论古代文艺思想中的文才尊奉观念”,《文艺研究》2(2012): 59—68。
- [Zhao, Shugong. “The Literary Talent Worship in Ancient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2(2012): 59—68.]
- 钟嵘:《诗品集注》,曹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Zhong, Rong. *Annotated Critique of Poetry*. Ed. Cao X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4.]

(责任编辑:查正贤)